

中国学者 看世界

◎王缉思 总主编

WORLD POLITICS —
VIEWS FROM CHINA

2

NATIONAL INTERESTS

「国家利益卷」

王逸舟 主编



中国学者 看世界

◎王缉思 总主编

2

WORLD POLITICS —
VIEWS FROM CHINA

「国家利益卷」

National Interests

王逸舟 主 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京权(图字)01-2006-728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王缉思总主编;王逸舟分册主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228-208-7

I.中... II.①王...②王... III.国际政治—研究 IV.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1994号

本书由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授权

新世界出版社独家拥有中文简体字版权

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

总主编:王缉思

本卷主编:王逸舟

责任编辑:程军

特约编辑:刘涟

装帧设计:大盟文化

责任印制: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00×1000 1/16

字数:277千字

印张:23.5

印数:1-5000

版次: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208-7

定价:40.00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学者看世界 | WORLD POLITICS - VIEWS FROM CHINA

《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

总策划：周明伟

总主编：王缉思

编委会

主任：王缉思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逸舟 牛军 张宇燕 庞中英
金灿荣 查道炯 秦亚青 阎学通

总主编执行人：江宛棣

编委会工作执行人：余万里

中国尺度 全球视野

(《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导论)

◇ 王缉思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力迅速增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并根据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制定了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直要求全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就为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学者指出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广阔舞台。

《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的宗旨，是向海内外广大读者全面展示21世纪初中国学者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这些成果折射出来的中国对世界事务的观点、视角。

作为开篇，简略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国际问题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也许对读者有所裨益。

欧洲主权国家的体系始建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

在此之前，神权与君主专制相融合，宗教战争连绵不断。以领土而非宗教为基础建立主权国家，主权至上、国家之间互不干涉内政，成为绵延至今的国际关系准则，并在此准则之上形成了国际秩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时期，中国还处在明朝末年。主权平等、国际法、国际秩序的概念，是在鸦片战争打开满清王朝的大门之后，方才进入中国的。

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欧美列强争霸、俄国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催生了人们对国际关系规律的探究，特别是研究大国之间爆发冲突与战争的原因和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和平的途径。在西方国家，“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专业，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兴盛于冷战时期。

国家是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最重要的单位和行为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的解体，加上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把主权国家的数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五六十个增加到今天的两百个左右。国际组织更是蓬勃发展。就此而言，国际关系已经大大复杂化、全球化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各国的内部变化和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变化。同时，许多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终极关怀，一直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首先关注的是欧洲工人运动，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今天，金融资本的扩张，先进技术和信息的传播，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犯罪活动、传染病和生态污染的蔓延，都越来越藐视领土和国界的限制。因此，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危机，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既有赖于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发展和进步，又有赖于跨国合作，有赖于国际秩序的改良、国

际规范和制度的完善。

于是，原本以“国际关系”为主题的社会科学分支，不得不拓宽其视野，与其他分支“联姻”，产生许许多多的“混血儿”。与其视“国际问题研究”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不如视之为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体。假设我们把国际政治放在政治学里，把世界经济（或国际经济）放在经济学里，把国际法放在法学里，把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放在历史学里，“国际问题研究”就不成其为单独的研究领域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发展并没有依循此路。西方国家没有由政府机构统一划分或规划学科的传统，因此这一学术领域的属性和称谓始终五花八门。有关这一学科范围的定义、内涵外延、理论基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直至今日仍在不停探讨，论著不计其数，论点众说纷纭。但是，无论如何界定，它在众多学科中独树一帜，继续拓展，并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是随着国家政治和外交需要的变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只有政府部门属下的极少数研究机构从事相关研究。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外交学院，归外交部领导。1964年，为了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成立了国际政治系。然而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未能促成国际问题研究的蓬勃发展。外交学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竟停办十年。

改革开放之后，国际问题研究重新得到重视。今天，仅是以“国际关系学院”（或类似名称）冠名、分属于大学的教学单位，就有40多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下，有8个研究所和若干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国际问题。据此推算，该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在中国大陆是数以百计了。公开发

行的该领域学术期刊，亦有几十种。还有以国务委员唐家璇为会长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等数十个跨单位的专业学术团体。在中国权威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那里，“国际问题研究”是同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并列的所谓“一级学科”，给予相当的重视。在其他大国中，惟有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与教学，拥有如此大的规模。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同中国正在迅速扩展的国家实力、国家利益、世界影响是相适应的。

国际问题研究成为一门迅速拓展、吸引公众注意的显学，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蓬勃发展，互联网问世，又恰逢冷战结束不久，国际大气候风云变幻。社会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需求量急剧增加，国际问题研究的成果供不应求。这一领域的学者开始在大众媒体频频露面，逐渐成为电视台“上镜率”最高的群体之一。90年代后期以来，专家学者对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发表评论，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国际政治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核问题等。在评点国际问题时，当然也涉及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阐释和评论。

鞭辟入里的国际评论，对国际形势和各国外交的深刻阐述，以至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都必须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编写本丛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让读者了解有代表性的学者专家对国际问题本身的观点，而在于介绍这些观点得以形成的学科基础、论证方法、资料来源，以及国内外政治背景。本丛书收入的论文，除去各卷的序言之外，共计一百八十多篇，分别由百余名学者专家所贡献。作者来自数十个科研院所、高等学府、政府部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丛书各卷主编都是国际问题研究各个分支领域中有相当权威的中国学

者。秦亚青主编的《国际秩序卷》体现了编者和作者关于国际秩序演变的哲学思辨，比较了中国秩序观同西方之异同。王逸舟主编的《国家利益卷》精选了有关主权和国家利益概念及其现实政策含义的论文，为制定外交政策构筑了理论基础。金灿荣主编的《大国战略卷》评说了世界政治格局、各大国的国际战略，展示了中国独特的战略视角。牛军主编的《中国外交卷》侧重于分析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考验，并具体评述了中国同其他世界大国和地区的关系。阎学通主编的《国际安全卷》既展现了国际安全理念的最新研究成果，又深入探讨了“台独”危险增加后中国必须应对的国家安全挑战。查道炯主编的《非传统安全卷》充分展示了全球化趋势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分别研究了经济、生态、资源、公共健康、跨境犯罪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张宇燕主编的《世界经济卷》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经济规律的认识，探究了经济同政治之间的互动、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融合。庞中英主编的《全球治理卷》介绍了国际社会兴起的“全球治理”概念，提出了在全球化条件下涉及精神文明、公民社会、法制建设、消除贫困、防止国际恐怖活动的许多建议和思路。

在各位主编所撰写的序言中，都介绍了自己所熟悉的学科分支或论题的理论基础，描述了国内研究现状，梳理归纳了不同观点，并且提出了主编的个人见解。再加上丰富多彩的近二百篇论文，可谓八路神仙，难分高下，百种鲜花，争奇斗艳。几乎每一个学科分支都有理由把自己当做主干，吸收其他分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

把国际问题研究切割成本丛书这样八大块，当然是人为的而非“科学”的。有人会问：“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都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概

念，我们为什么要急急忙忙采用？无可讳言，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从概念到内涵外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影响。然而借西方观念为中国所用，本是无可非议的。正如王逸舟在他的分卷序言里所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前，“国家利益”的概念曾经不容探讨，而今却成为不可缺少的政治坐标。其实，连“世界”、“经济”、“政治”这些最基本的中文词语，也不过是一百多年来约定俗成，并非古已有之。“主权”观念更是由舶来品转化为深植于中国政治和外交的不可动摇的原则。“非传统安全”的概念源于西方，但早已进入中国官方的声明与文件。本丛书中，还探讨了一些在国际社会应用已久但尚未为国内读者所熟知的概念，如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等。本丛书尊重各位主编、作者对概念的使用，没有强求统一，等待将来的约定俗成。

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论题面前，想在国际问题研究各个分支中找到相同的思想渊源、学理基础、探究客体、实践对象，是做不到的。如同无法找到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的物理学理论、能够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史学理论一样，我们难以建立研究国际问题的能够包罗万象的一项理论，甚或一套理论体系。一些学者主张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建筑一座知识大厦；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各学科交叉融合，或研究方法的严谨科学，或国际政治的实证考察，或现实政策的评析跟踪。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每一门现代学问都需有其理论和方法。构筑自己学科的理论框架，成为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孜孜以求而似乎又可望不可即的目标。

国际问题研究同中国外交政策的相关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90年代以前，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少发表意见，研究中国外交也得不到鼓励和支持。首先，本领域的中国学者多

是从研究外国或者当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关系起步的，除了公开发表的文件资料以外，缺乏关于中国外交的其他信息来源。一些对中国外交感兴趣的研究者，只能从海外的有关书刊和解密的外国官方文件中得到资料。所谓中外关系研究，更多探讨的是外国对中国的政策和观点，或局限于一般的历史陈述。倒是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率先发表了关于中国外交的学术论著和历史反思。其次，过去中国外交决策过程和处理的事务相对集中，相对封闭，没有咨询社会上的专家学者的迫切需要，也没有这种传统和机制。

近20年来，政府部门与学者之间相互隔绝的现象有了很大改观。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自古以来就有议政甚至从政的传统，当代国际问题的研究者更不缺少经世致用的参与感。随着国内思想的开放、国际交流的增加、海内外媒体的促进，一批学者不仅对国际事务发表评论和著述，也开始就当前中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海内外的学术研讨会、讲座、研究课题越来越多地涉及现实外交问题，或者就是以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中国的国际角色为主题。这些交流活动的副产品，是把原先相互接触不多的官员和学者聚在了一起。国际讲坛、书刊和媒体上有关中国的话题却被外国人所垄断的不正常现象，逐渐得到了纠正。

国际问题学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党政部门指导、鼓励和咨询的结果。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有若干次涉及国际问题，并聘请有关学者进行讲解。外事、国防、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决策部门和工作部门注意拓宽思路，广开言路，关注并借鉴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座谈会、委托课题等方式，同学术单位、研究单位沟

通，一些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还到中央党校、大学和研究单位举办讲座，介绍动态，阐述政策。由于所涉及问题的敏感性，公开进行政策性争论是不恰当的。但是在不公开的咨询活动中，政府部门总是鼓励学者畅所欲言，甚至有意邀请一些持不同观点、不同视角、不同知识背景的专家相互切磋，以达到百家争鸣、集思广益、献计献策的目的；有关部门也时常做背景“吹风”，介绍自己的宏观工作计划和思路。

除了各分卷的序言外，本丛书收集的论文都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刊中公开发表过。不难发现，在符合国家总政策的前提下，国际问题学者的言论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例如，中国的对外政策要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既定的原则。但如何区别国家利益（如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同层次，如何确定国际战略各个目标的轻重缓急，学者可以各有解读。又如，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业已明确宣布的国家战略。但是，历史上有没有大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先例，中国在强国征途上能否避免其他大国的暴力阻挠，学者可以各执一词。又如，中国面临巨大的安全挑战，要居安思危，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同时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这是大政方针。但世纪初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究竟是越来越严峻，还是有所改善并且将继续改善，学者一直在探讨。又如，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是中央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总概括。但如何分析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进程对中国的利弊，又如何趋利弊害，学者众说纷纭。又如，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的一条重要原则。但“全球治理”的概念意味着对内政与外交的分界需要重新认识，对此已有许多中国学者加以评介。又如，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但是，区域合作的最终目标是不是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东亚共同体”，它同 APEC 等其

他区域合作机制将是什么样的关系，各国政府都没有提出明确具体的战略设想，中国学者思想驰骋的余地很大。

凡此种种，说明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政府观点同专家学者观点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复杂关系。二者都不是静止的，而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化充实之中。国家大政方针对学者观点起着引导作用，但并不束缚学者的独立思考。本丛书选取论文的主要标准，除了其学术性外，也希望它们容易为本行业以外的读者所理解。如果丛书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以及对自己国际角色的定位，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但丛书刊载的具体观点不能代表官方。我们更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看世界的视野、尺度，他们所持的价值观，进而帮助读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它与国际环境的互动，以至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

在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多次讨论到“学者”的定义问题。编者把“学者”的范围缩小到“以学术研究和教育为主要职业的人”，同时也收录了少数几篇由某一领域的专家撰写的论文。考虑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以外的读者的兴趣和知识，本丛书没有选入专门探讨学术理论或介绍国外学术观点和动态的论文。同时，为了突出丛书的学术风格，学者所撰写的非学术作品，如政策分析、对策建议、战略宏论、时事评论等，没有收入。当然，在这一学科之外，诸如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等领域，都还有许多著述可以反映中国学者的国际观、世界观。尽管如此，介绍“中国学者看世界”的任务，本丛书是全面担当起来了。

本丛书得以问世，应归功于中国外文局的支持和指导。局长蔡名照先生等领导对本丛书编辑出版的全过程给予了高度关注；该局所属的香港和

平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新世界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丛书的繁体字中文版和简体字中文版。

就个人贡献而言,周明伟先生首屈一指。明伟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出版这样一套丛书的创意,并且身体力行,主动提供了丛书出版的各项必要条件,又亲自参与项目策划、设计和编辑。他的才华、学识和社会责任感,是丛书的原始推动力。当丛书的繁体字版面世时,明伟先生坚辞“总策划”、“特别顾问”或任何其他头衔。在简体字版的出版过程中,他的指导作用依然不可或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简体字版付梓之际,我们坚持要请这位名副其实的“总策划”露面,并对周明伟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江宛棣女士在一年多的业余时间里,全力以赴地组织、建议、审阅、督促,对丛书的内容和形式倾注了大量心血。她的中英文编辑专业水准令人钦佩。刘涟女士的责任心和细心同宛棣不相上下,相互配合天衣无缝。直到繁体字版大功告成,我才知道刘女士也是在贡献业余精力,而且是带着高深的文化眼光,第一次编辑政治性很强的书籍。余万里博士是在所有相关人员中穿针引线的人物,是在参与本丛书工作的学者中,付出精力最多、贡献最大的人。他的专业见解和组织能力,很难想象能有人替代。各位分卷主编的功力和眼界,都已体现在细致的设计和编辑工作中间,在此不再一一致谢。

本人能同这些志同道合的学长、朋友共事,从他们身上体会治学为人之道,深感荣幸。我们最大的共同希望,是海内外读者能够从丛书中读出滋味、乐趣,和我们分享用中国人的尺度观察世界、用中国人的情怀融入世界的感受。

2006年12月

新视野下的国家利益观(代序)

◇ 王逸舟

当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而无比丰富的国家。

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急剧变化而无比丰富的学科。

当代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的探索和思考是一个急剧变化而无比丰富的过程。

阅读《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有可能给读者一个急剧变化而无比丰富的想象空间及信息储备。

以上是我作为主编，在编撰完成本卷之后，心底油然而生的一点真实感受。下面，我想概括一下中国学术界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研究成果，再讲讲我自己的看法，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中国学术界有关“国家利益”问题的研究。

一、中国学术界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来

取得最大进展的领域之一。基本上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领导层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考虑有独特的实现形式，但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是谈不上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家利益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而相对系统的研究则是在90年代以后。

根据现有的调查，^①目前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的成果从文献形式看，包括专著/教材、期刊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三种。其中专著有七部，包括：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洪兵《国家利益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剖析“美国利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杨玲玲《当代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利益》（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方长平《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朱炳元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期刊论文构成了中国学界关于国家利益研究成果的主体，根据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国家利益”作为题名进行的检索，1990~2005年这十五年间的文献有398篇。博士学位论文有3篇，分别是：方长平的《国家利益分析：一种建构主义视角》（2002年）；杨丽的《国家利益的新认识》（1998年）；杨玲玲的《当代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利益》（1997年）。显而易见，本书里收入的二十余篇论文或书稿章节，仅仅是上面提到的成果中的一小部分，反映的是若干个断面或侧面而已。这一点特别要对读者说明。我的意思是，假使有心的读者想做专题研

① 见方长平：《国家利益研究在中国：现状、成就与问题》，载王逸舟主编：《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1995~2005）》，即将出版。本文有关国家利益问题研究的数据，很大程度上取自于此报告。在此谨向方博士表示感谢。

究，不妨循着这里提供的线索深入下去。

依照近些年的发展线索，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的几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探索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6年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出版，为最早的阶段。这一阶段关于国家利益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国家利益的阶级性、民族性以及意识形态关系、国家利益的内涵等，侧重于概念的厘定、属性的辨析。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基本上还是采取阶级分析法，对国家利益的阶级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全民性的认识。在具体研究手段上，以分析、描述、定性等传统手段为主，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相对缺乏。在这一阶段，专门研究国家利益的专著还没有，有关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于一些政治学、国际政治类的教科书和专著中。如果说在传统阶段中国国关学界关于国家利益研究的问题还停留在一般性的定性描述上，那么1996年阎学通出版《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首开先河，把中国学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从传统阶段推进到比较规范和相对科学的阶段。作者在效用分析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分析国家利益的科学方法，为判断中国国家利益的大小提供了一种衡量依据。以此为工具，他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具体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进行了分析和衡量，并且提出了如何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建议。他的分析基点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人们完全可以科学界定、衡量和实现它。这本书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国家利益问题的系统、全面研究。从前面列举的专著和发表在期刊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看，国内学界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出版之后出现了国家利益研究的热点。在这一阶段，学界的研究除了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内涵、属性以及对相关概念的关系做规范研究外，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实证研究上。学界开始超越对国家利益本身进行的探